

中国文学经典书库

乔力 主编

先秦文选

刘刚 选注

太白文艺出版社

太白文艺出版社
北京 北京联图

01

中心
公司 发行

总策划：马 爽

责任编辑：黄道京 李 玲 高子如

封面设计：石 洋

版式设计：叶凤岩

中国文学经典书库

- 诗经楚辞选
- 先秦文选
- 汉魏六朝诗选
- 汉魏六朝文选
- 汉魏六朝辞赋选
- 汉魏六朝小说选
- 唐宋诗选
- 唐宋词选
- 唐宋文选
- 唐宋小说选
- 元明清诗词选
- 元明清文选
- 元明清曲选（上、下）
- 元明清文言小说选
- 宋元明清短篇白话小说选（上、下）
- 三国演义（上、下）
- 水浒全传（上、下）
- 西游记（上、下）
- 儒林外史
- 红楼梦（上、下）
- 现代诗选
- 现代散文小品选
- 现代中短篇小说选
- 现代戏剧电影文学选
- 现代女性文学选
- 中国文学史（1~5册）

ISBN 7-80680-143-X



9 787806 801437 >



ISBN 7-80680-143-X/I · 077

定价：18.00 元

中国文学经典书库

先秦文选

刘刚选注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先秦文选 / 刘刚选注.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04
(中国文学经典书库 / 乔力主编)

I . 先... II . 刘... III . 古典文学—作品集—中国
—先秦时代 IV . I21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27166 号

中国文学经典书库

先秦文选

刘 刚 选注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

太白文艺出版社北京图书中心发行

(北京丰台区木樨园珠江骏景园 17 楼 (010)87873533 邮编 100068)

新华书店经销

华北石油廊坊华星印刷厂印刷

850 × 1168 毫米 32 开 8.75 印张 198 千字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ISBN 7 - 80680 - 143 - X / I · 077

定价: 1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 065007)

总 序

乔 力

五千年的悠久历史会天然地形成一种非常优势,使得中国文学有可能在足够漫长的时间里创造出辉煌业绩,给人类文明留下极为丰厚的精神遗存,供我们民族永远怀想受用。不过,像许多事物都拥载着多元复杂属性一样,如果从对面角度来看的话,则又同时变作某种很沉重的承传负担。因为一旦面对这些山聚海积般浩繁汗漫的书册卷章,便立即涌生出接受的困难困惑:你到底应该读些什么?究竟怎样读?而实际上又能够读得了多少?——局限于主客观种种条件的制约,社会或个人都难以做到无论巨细差等,皆通体包纳,所以,就必然性地出现了如何选择乃至精选的问题,并进而牵涉到一系列的判断观念和运作标准。

新世纪伊始,直面自然人文等各学科门类的分工日趋专精细密、生活工作节奏紧张快捷、实用功利目强化而竞争异常激烈严峻的局面,现代中国早已疏离了古代农业社会那种伴青灯明月、细细把玩体味以穷年皓首的闲散心境与惟求任心适意、不需再计虑效果收益的淡泊无为态度。那么,已然产生凝定而属于历史的文学作品,怎样才能跟随不断发展前进的时代步伐,仍成为文明生活不可或缺的有机构成,融入未来,并由民族走向世界,张扬它永恒的美?换言之,永远是人们感性的愉悦飞扬和理性上育导教化的绝不能被替代的必需。

缘于上述,我们方始编纂这套大型书库,指出了贯通古今、以时代纲领文体的结构框架和精选的、具载恒久垂范意义的“经典”式作品总汇——即通过纵向的历时性观览,从整体上展现自远古

洪荒的先民制作开端直至最较晚近的1949年以前的所有中国文学产生、发展、丰富、极盛而蜕变新生的流变轨迹与大略面貌。使人们在直觉审美感受的过程间,获取系统全面的中国文学知识,熟谙洞悉它的每个结构成分。另一方面,也借助横向共时性的断面取舍,使得相应的具体作品充分传现那些关于文学本体以及某一特定文体样式的美学特性和艺术精神;并因其创作巅峰的最绚丽景观所辉耀的最大可能性范型价值,或由一定的阶段空间所显示出的一定更代嬗变类型。要言之,它们既包容有当时的复杂社会现实的典型意蕴,同时又未曾丧失、消解掉充沛张扬的现代生命活力,乃是屡经时间长河的荡涤淘洗,以代积层累方式架构起巍峨的中国文学经典大厦。它千门万户、千姿百态,永远流闪着辉煌璀灿之光。

下面再就《中国文学经典书库》的诸有关事宜略为阐明:

——首先是读者定向。我们关注的是具备中等文化程度,乃至大学生、研究生、工作着的白领蓝领们与所有对中国文学感兴趣的最广泛的读书界朋友。衷心希望《中国文学经典书库》能成为你们的“精神家园”,为你们不断追求探索的焦灼心灵伸展开一片清新温馨的绿荫,吹进青春热情的气息。

——其次是编纂的框架构想和意图。这里自然是以文学作品为主体部分。具体而言,每种精选本前皆首先设置“导论”,概述本文体于此书所界定之历史时段内的演进行程和重要业绩,并在相对应的社会文化大背景上,论析其表现特征、思想内涵及主流艺术精神;进一步阐述因整个文学现状与此特定文学样式自身运动规律所生成出现的创作流派、风格面貌。而以后的篇幅,则以选录的作家作品为单元。“作家简介”除却例行的生平行迹说明外,特别注重其文学活动及与文体相关的创作情形,目的在于强化“评论”色彩,由之使这种个案的微观烛照同“导论”的具体文体现象的中肯评析,以及《中国文学经典书库》收入的《中国文学

史》中的“总论”《中国文学流变概说》所作的宏观把握,形成为点、线、面纵横交织、互相呼应的框架结构模式。至于选录作品,首先认定的是审美价值——一种纯文学本体的意义,然后就艺术创造性来统领其他社会教化等内涵,求得两者的有机融合。其后的“品鉴”,则无论总瞰俯览、远察旁涉为印证而生发妙境,还是探幽抉微、精壁细辨以臻达澄彻洞明之胜地,抑或径从个别主旨、意趣、背景来进行阐释考订,均系视各自实情的需要落笔,并不强求规范一致。相反,我们倒是力求多角度、广视点的繁色纷采,精当出新。

《中国文学经典书库》除却主体的作品部分,还另有五种既断代又互为联续衔接的《中国文学史》,虽然各自具载相对独立性,但整合总观之,则成为从先秦直至现代的通史。考虑到前面主体部分既有的“导论”、“品鉴”及此书中的《中国文学流变概说》,已经构成的交错呼应的网式框架所涉及过的内容,为了避免重复,同时也便于改变、拓展视野,故这部文学通史则侧重于对那个特定时代背景上整体文学面貌的宏观把握,注重描述其行进过程中产生的艺术流派及创作风格、文学思潮、重大现象等,尽可能地弱化一般作家作品的具体剖析。当然,在总则方面遵循这种撰写精神的基础上,各断代文学史也有各自的特点,方式方法并不求整齐划一。

——另外,作为一部集体协力撰写完成的大型丛书,我们一直强调贯穿通体的连续谐调指向,故而与另一类的个体研究著作同样承载着严肃的责任感。应邀参加的多为学术造诣深厚精湛的著名古典文学专家,他们来自北京、上海、山东、广西、辽宁、山西、江苏、福建、湖南、四川、贵州等地声誉卓著的高等学府和专业研究机构,其中有些熟识并在我主编的另一些丛书、书系里多次合作过,有的却是首次共事。但无论怎样,我们大家都抱有事业与友情并进的相同宗旨,愿意在有限的生命途程中做一些有意义的事,留下一段美好愉快的记忆,以慰藉那本原性的苍凉。

上个世纪初,值当新旧时代交替之际,“五四”的一批知识精英以大智慧、大学识、大勇气,奋然打破了中国几千年的专制、僵化、因循守旧陋习,引进西方近现代文明,倡扬“民主”“科学”精神,吹进来健康新鲜空气,以永远的青春和激情开启一代新风,让人们看到希望和未来——每想到这些,我就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如今又值新世纪伊始,考量已往,眺望前途,将会作出什么样的思考呢?我想,是该出现文学文化大师、学术巨人的时候了。但现今触目所见,太多了些掂斤称两的匠人雕琢的小家子气。就一定意义而言,大师巨人的产生需要最广泛普遍的、适宜的文化基础与时代土壤,但适宜的基础、土壤则需要长时期的积累培植。那么,就让我们脚踏实地,从提高整个民族的文明素养、文化学术素质起始,作一些消除浮躁之气、纯净人们心灵、积累培植基础的工作吧!记得上世纪40年代初,傅雷翻译的罗曼·罗兰《名人传·贝多芬传》的“译者序”说:“不经过战斗的舍弃是虚伪的,不经劫难磨炼的超脱是轻佻的,逃避现实的明哲是卑怯的;中庸,苟且,小智小慧,是我们的致命伤……现在,当初生的音乐界只知训练手的技巧,而忘记了培养心灵的神圣工作的时候,这部《贝多芬传》该有更深刻的意。”我想,这是“五四”精神的延续和一种新的演绎。由是言之,除却工艺技能与客观科学知识的训练、学习外,文化文学素养的充益提高,对于“心灵”来说也是绝对必要的。我们同着新世纪的朝阳前行,是应该也完全可以有所作为,这既是幸运,也更是历史的使命——《中国文学经典书库》便是最新一份工作成果,愿新世纪的人们喜欢它。

无庸烦言,限于学识和精力,诸多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朋友批评教正,这是对我们的关心与鼓励,铭感之情将永远在我们心中。

2004年春于北京旅舍

导 论

先秦散文是中国古代散文的源头,不过,这一源头在历史的时间广野上流经了漫长的岁月,假若从汉字的产生时散文的滥觞之源算起,迄至公元前二百二十一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中国古代散文已成大河之势止,大约有两千年的历史,它要比其后秦汉至明清的古代散文的流经时间更为漫长。在这段漫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古代的散文,在培胎,在孕育,在历史的阵痛中呱呱落地,在时代的养育中茁壮成长,到了战国末期,它已呈现出一个成年人的风采。在这段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古代散文与其后秦汉至明清的古代散文相比,更显得嬗变幅度大,发展速度快,而在春秋战国时期尤其是这样。更值得人们注意的是,在先秦散文日趋成熟的那段时期内,先秦散文在沃土中埋藏下了各种文体的种子,等待着后人去培植、去浇灌,去创造古代散文世界的缤纷春色。同时,先秦散文也积累了丰厚的写作技巧,创作经验,为后世古代散文的飞速发展,做好充分的准备,就象一张弦拉满的弓,将发射出古代散文之箭。面对如此漫长、如此生机勃勃、如此蕴藏硕硕的先秦散文的发展历史,谁不想遨游其中,去沐浴那有如初升旭日的艺术阳光。

一、结绳记事时代散文因素的推测

人们谈起文学艺术的起源,总是从诗歌谈起,认为在文学部门里,诗歌是最初的文学样式,中国人是如此,外国人也是如此;古代

人是如此,现代人还是如此。这当然没有错,然而问题是诗歌并不是一粒万能的种子,或魔力无边的神丹,后于诗歌产生的文学的样式,诸如散文、小说、戏剧等等,难道都是这诗歌种子萌发的?或者说是这诗歌神丹的魔力变化?事实当然不是如此。各种文学样式都有它独自の起源。这里仅就中国古代散文来说。如果说,诗歌的产生先于散文,我们并无异议,但如果说,散文的起源后于诗歌,我们却不会同意。因为,假设原始人抬木头的“杭育杭育”的劳动呼声就是诗歌的起源,我们也可以假设,原始人关于抬木头劳动的结绳一类的记事便是散文的起源。有人可能会笑,在绳子上结个疙瘩就会是散文的起源吗?这一问有理,若用绳子上的疙瘩表示一、二、三的数字,这当然不是散文的起源,若这绳上的疙瘩仅是记事的辅助,它帮助人们记忆某次部落间的战争、或某次天灾人祸、或某次部落的大迁徙,那么,这便可以说是散文的起源了。根据这一假说,可以这样认为,散文与诗歌的起源是同步的,只不过诗歌的生长期短而散文的生长期长,所以,散文的诞生才晚于诗歌。

遗憾的是,原始结绳记事时代,是人类的蒙昧时代,由于那个时代没有文字,我们还不能确切地描述那个时代的记事情况,然而,事情也不是完全悲观,因为在先秦的典籍中保存了许多原始结绳记事时代的传说与神话,我们认为这些传说和神话就是当时的记事,经世代的口耳相传流传下来。例如《山海经》中《招摇之山》是关于地理及物产的记事,《形天与帝争神》是关于原始部族间战争的记事,《夸父欲逐日景》是关于原始人与自然抗争的记事,还有《庄子逍遥游》中“尧让天下与许由”的传说,《韩非子·五蠹》中有巢氏、燧人氏、鲧和禹治水的传说,都毫无疑问是结绳记事时代记事的流传。尽管这些结绳时代的记事,在流传过程中,历经了口耳相传的讹变,历经了文人笔录的文字润饰,甚或变得面貌全非,但是我们从中还能看到结绳时代记事的影子。从先秦典籍中载录的传说和神话来看,结绳时代的记事有着它独特的方式,它不是用文字

记录在简册上,而是用语言记录在脑子里。由于原始时代,人们还不能也不可能科学地认识自然、万物,以及人类自己,不可避免地在记事中带有原始的宗教崇拜、宗教迷信的色彩,不可避免地在记事中出现事物误识现象,因而,结绳时代的记事往往把人、事、物神化,或者说原始人原本就是这样认知的,而这些记事在世代口耳相传中,又产生了语言韵语化、事件故事化的特点。我们认为,结绳时代的记事便是后世散文萌生的种子。

二、文字记事之初散文因素的研究

中国文字的产生,从距今六千年左右的西安半坡原始部落出土的陶器上的符号到殷商时期的甲骨文,大约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历史。这是从结绳记事的结绳化为刻记符号到文字形成体系、能基本记录语言的历史。历史学家和文字学家认为,真正意义上的文字的产生,不能以个别字形的产生为标准,而是以文字达到一定数量能基本记录语言为标志。由于甲骨文已是较为成熟的文字,单字数量已经达到了四千五百个左右,所以历史学家和文字学家推测,中国文字的产生,大约在距今四千年左右的夏商之交时期。这意味着,用文字记事的时代从这时便开始了。但是夏商之交及稍后的原始文字资料出土的还很少,还难以根据这一时期的文字资料研究当时的记事情况,故而我们只好以甲骨文记录的卜辞作为资料,来研究散文产生的因素的问题。

甲骨卜辞,是殷商时期刻在或写在龟甲兽骨上的记事性文字。以内容而言,则是殷商王室占卜时对前辞、问辞、占辞、验辞的记录。前辞,交待卜贞日期与卜者名字;问辞,说明所卜之事;占辞,记录占卜征兆;验辞,补记占卜后的结果或应验的情况。虽然甲骨卜辞所用的文字都非常简短,一般只是十几字到二、三十字,五十字以上的极少,一百字以上的仅发现一例,但结构严整,有序,从此

可以推测当时记事文字已达到了相当的水平。

《易经》，稍后于甲骨卜辞，它与卜辞一样也是占卜性的记事文字，但却不象卜辞那样大多在占卜之际即写出，而是长久流传的作为一种有灵验的兆辞。如《明夷初九爻辞》：“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这则爻辞虽本是记述一个落难君子流亡之事，但作为爻辞则蕴含了一种预示吉凶的测卜命意，虽说充满一种神秘色彩，但说穿了实际上不过是用君子落难流亡之事，暗示人的灾祸，可以说是一种特殊形式的以事说理。传统说法认为爻辞为周文王所撰，其实应当是周文王对当时流传的占卜性格言民谚的辑佚，这些爻辞，语言简短，文词古朴，与甲骨卜辞非常接近，很可能是甲骨文时代民间占卜的产物。纵观《易经》中的卦爻辞，虽然是先民用来占卜吉凶的迷信文字，但它常片断地记录当时的社会生活情景，以事示意，其中包含了时人的一些生活经验，甚至带有某些哲理性。因此，有理由认为，《易经》卦爻辞是古代的说理散文的萌芽。

三、商周时期史官散文的诞生

商周时期，历史已从蒙昧步入了文明，文字的发明，促成了这一时期文化的大跃进。且不说这一时期的“恒舞于宫，酣歌于室”的宫廷乐舞，也不去说这一青铜器时代物质文明的辉煌，仅以古代散文而言，这个生长期太长太长的文学样式，在时代文化大背景的催生作用下，终于诞生了。但是，与可以口头创作的诗歌不同，散文这一依赖于文字的书写文学，由于当时文字的难写、难读、难识，与阶级等级森严等原因，还只能保育在王室、宫廷的襁褓中，只能是王公贵族的宠儿。《尚书·多士》中说：“殷先人有册有典。”而我们今天能看到的殷周典册，诸如《尚书》、《世本》、《逸周书》，都出自朝廷的王官之手，均属于史官的记叙。

《尚书》，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记叙文和论说文文集，是春秋以前历代史官所收藏的政府重要文件以及政治言论的选编，在先秦时代大约已有定本，汉代学者大都认为是孔子编纂的。《尚书》分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部分，其中虞书和夏书是后世史官根据古代传闻编写的，而商书和周书比较可信。“商书”是殷商王朝史官所记的誓命训诰，如《盘庚》篇是殷王盘庚迁都时对其臣属、百姓所作的讲演辞，辞语虽古奥，而比喻却通俗、贴切、生动。“周书”包括周初至春秋前期的散文，亦不外于誓命训诰之类，如《无逸》篇是周公劝戒成王的奏书，论事明晰，有层次，尚能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人物的口气。

《世本》是先秦史料丛编，记三皇五帝至春秋间史事，也有一点战国到汉初的记录，其中史料以春秋前最为详备，因此研究者认为，它原本是周王室史官保存的历史档案，后来由秦汉间人增补汇编成集。《世本》分为七部分，《帝系》、《世家》记述帝王诸侯世系，《谱》记述周王及诸侯年表，《传》记述春秋前人名事迹，《氏姓篇》记述先秦贵族族谱，《居篇》记述王城都邑的变迁沿革，《作篇》记述上古的发明创造。虽文词简短，只录事实，不加描写，但分类记事，体例该备，对后世影响颇大。

《逸周书》是古文献汇编，其述作年代，早者先于《左传》，被认为是“孔子所论百篇（指《尚书》）之余”，晚者延及秦汉，是为后人增补。就《世俘》、《克殷》、《商誓》、《度邑》、《皇门》、《祭公》、《作雒》等周代文献来看，有与甲骨文、金文相合者，有较《尚书》、《史记》为详者，文字则有的简朴，有的夸饰，记事有层次，有情节。

《汉书·艺文志·六艺略》说，“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从商周时期的典籍来印证，班固所言基本符合历史事实。《尚书》与《逸周书》所收篇什，有记言者，有记事者，而《世本》各篇均属记事。纵观商周时期的散文，从本质上说皆为历史散文的范畴，突出表现了历史散文实用性的特点。从《尚

书》、《世本》、《逸周书》这三部典籍中,可以获知,当时记史是分门别类的,而门类又颇为细琐,照比甲骨文时代有了长足的进步;当时记史又有详略的不同,对于一般的史事记述较略,只是“大事记”式的提纲样记叙,对于重大历史事件,无论是王公的重要言论,还是战争、迁都,都详加记叙,因而《世本》所记者略,《尚书》、《逸周书》所记者详。商周时史官“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的分工,对刚刚诞生的古代散文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它导致了古代散文的第一次裂变,即从记史中裂变出记言与记事两体,记言多有说理的色彩,由此引发了后来的说理文,记事则由简渐详,是后世历史散文的先声,而二者的相互渗透,碰撞,弥合,更促发了古代散文写作技巧的逐渐成熟。

四、春秋时期学者散文的诞生

春秋时代,是个大变革的时代。新兴的地主阶级蓬勃兴起,没落的奴隶主贵族日趋没落,新的封建制社会正在以不可阻挡之势取代着旧的奴隶制社会。社会制度的换型,也引起了文化的大革命。就在春秋中叶,第一个宣布承认地主制度的鲁国,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私学。鲁国的孔子(名丘),以“有教无类”相号召,大办私家讲学,有弟子三千,蔚为大观。在他的弟子中,有子贡那样的富商,也有颜回、原宪、子路那样的贫寒子弟,有鲁国本国的青年,也有来自卫国的子夏、来自陈国的子张、来自宋国的子牛、来自齐国的子迟,甚至有来自秦国的子南、子徒,来自楚国的子石、任不齐,可谓盛极一时。私学的产生,彻底打破了朝廷王官垄断文化知识的格局,使文化教育得以更大范围的普及。其实当时,设立私学并非孔子一家,四方诸侯,大多有自设的私学,《左传·昭公十七年》中就有“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说法。在这样的文化大背景下,到了春秋末年,私家的著述便应运而生了,这样便诞生了学者的散

文。鲁国孔丘，楚国李聃就是当时的学者。

《春秋》，是孔子根据鲁国的史料编纂的一部编年体史书，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由私人编撰的史书。《春秋》记事，使用了简洁而谨严的结构，一般是以何年、何月、何日、何地、何人、何事及事情结果为次序，系年记事，有条不紊。虽然《春秋》和《世本》一样还只是提纲式的记史，但其纪实的史学观、借鉴君王的修史目的和褒贬的笔法，对后世历史散文有着深远的影响。

《论语》，是早期的语录体散文，主要是孔子言论的记录，其文字大都很短，简洁而概括，一般只叙说观点，而不加详论，然而多精炼警策，富有哲理性和启发性。与记言为主的《尚书》相比，已表现出很大的进步，最突出的进步是它更为接近口语而又讲究文采，体现了孔子“文质彬彬”的审美观。

《老子》也属于“记言”的语录体散文，但与《论语》不同，是有韵的简明的哲理性格言，虽文词不求修饰，但逻辑性颇强，蕴含的道理玄奥深刻，显然接受了《易经》卦爻辞的影响，而又与《易经》的神秘性说理又有质的区别。它是先秦散文历史上第一部学者言论集。

学者散文的产生，在先秦散文发展史中有着划时代的意义。虽然它是承继此前史官散文发展而来，但已与其有了质的差别。就说理散文来说，它不再从“记言”的史家角度，去机械的记录王公的誓、命、训、诰，而是以学者自己的睿智，去宣说自己的人生观、政治观；就历史散文来说，它不再从“记事”的史家角度，去按照帝王的喜恶描述历史，而是以学者的历史观，去评价历史事件、褒贬历史人物。从文学的眼光审视，学者的散文已不仅是“记言”、“记事”的实用性文字，它已具有了教育性、思想性，以及一定的文学欣赏性。这无疑是一个质的飞跃。学者散文的产生，标志着先秦散文经历了漫长历程终于步入真正意义上的古代散文的艺术殿堂。学者散文的产生，有如天鸡一唱，带来了百家争鸣，呼唤出中国古代

散文的第一轮朝阳。

五、战国时期历史散文的发展

战国时代是诸侯兼并、互相攻伐的时代，也是合纵连横、激烈斗争的时代。新的历史形势，对史学产生了新的要求，如何总结历史经验，为当时的社会斗争服务，便成为当时史学家面临的新的课题。这一重大的社会需求，促成战国历史散文的大发展，因此，这一时期先后涌现出《左传》、《国语》、《战国策》等一批历史名著。

《左传》成书于战国初期，它仿照《春秋》用鲁国国君的世次编年序写，博采《春秋》以外的其他史籍，及当时许多口耳相传的史料，形成了近二十万字的规模宏大的新史书。它综合此前史官散文记言与记事为一体，而又以记事为主导，用大量的历史事实，弘扬了它尊王的大一统思想。

《国语》也成书于战国初期，与《左传》不同的是它是一部分国记载的国别体史书，全书分载了周、鲁、齐、郑、晋、楚、吴、越等八国的历史片断。《国语》重在记言，而记事简略，旨在用历史人物的言论思想为君王提供借鉴。

《战国策》是战国末年和秦汉间人所纂集的历史著作，虽成书略晚，但其中所记是战国时各国史官和一些游说之士记录下来的史料或文稿，其书基本依照《国语》的国别体，分载战国时秦、齐、楚、越、韩、燕等国的历史片断，与《国语》不同的是，它在记言、记事兼备的同时突出了人物活动的记叙，而写作倾向是重在表现纵横家的思想。

从《春秋》以来，学者历史散文的发展，《左传》、《国语》、《战国策》本身便是它的历史轨迹。从文字上说，是由简向繁发展；从体例上说，是由编年体的单一形式，向编年、国别两体的多元化发展；从内容上说，是在古史记言、记事分体的基础上有所综合，但又有

侧重,或重在记事,或重在记言,或重在记人;从记史观和表意倾向上说,孔子的“纪实”史观一直贯穿于战国历史散文的始终,而表意倾向则由《春秋》的“一字褒贬”,而发展为以事以言,即借史事渗透作者倾向,时或也出现了借“君子曰”议论评点的表意方式;从文学的角度说,语言有由质朴、平实,向流丽、夸饰发展的趋势,叙事有由记述梗概,向叙述具体情节发展的趋势,有故事化的倾向,写作技巧更在不断地丰富。在战国历史散文的发展中,还有一个应该引起特别注意的现象,这时的史书已不再像《世本》那样,去分门别类地记述各个方面的历史,它的写史触角只对准了历史事件和事件中的人物及人物言论,似乎表现出一种对于“史”的离心力,正是这种离心力,使战国的历史散文,既不同于此前的史官记史,也不同于后世《史记》以下的正史,而成为既是史学著作,又具有文学色彩、文学价值的文史两栖著作。

六、战国时期说理散文的发展

随着封建制取代奴隶制的社会制度的转换,早在春秋时期就出现了的“士人”阶层,到了战国时期,在私家养士、君主重士的时尚中,蓬勃崛起。士人们纷纷走上政治、外交、军事的大舞台,“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汉书·艺文志》),围绕着当时的社会问题,提出自己的思想观点和政治主张,他们四处游说,兴学讲学,又互相论战,各执一端,一时间形成了“百家争鸣”的文化局面,呈现出战国说理散文的空前繁荣。

墨子,墨家学派的创始人,主张“兼爱”、“非攻”。对于文章提倡重内容、轻形式,崇尚实用,轻视文采,因此《墨子》文字质朴有余而文采不足,但能运用有本、有原、有用的三表法,即“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写作论辩。文章持论谨严,论据充分,且每篇都有